

...come to us as soon as possible.
...give you the travelling expenses
...but because of shortage of funds here
...ly to have about
...g-back journey. I will remit some
...from Comrade Chantaly and I will
... wishes and regards.
...incerely yours

Chiang Kai Shek



马林传

Henk Sneevliet

李玉贞/著

- 他是一位活跃于欧亚舞台的知名的国际活动家。
- 他在一战前后的世界风浪中和中国、印尼人民共同奋斗过。
- 从2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直到30、40年代的反法西斯斗争中都有他的足迹。
- 他一生执著追求崇高理想。
- 每年4月，他的同胞都向他的墓地献上盛开的郁金香。

中央编译出版社

马林传

Henk

Sneevliet

李玉贞/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林传 / 李玉贞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6

ISBN 7 - 80109 - 462 - X

I . 马... II . 李... III . 马林(1883—1942) - 传记 IV . K835.637 =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4467 号

马林传

李玉贞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66521152(编辑部) 66171396(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ctp.com.cn>

E - mail edit @ 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金瀑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340 千字

印 张 14.875

版 次 2002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斯内夫利特为共产国际工作时曾经使用的化名：

马林 Maring, Маринг

安德莱森 Andresen

亨克·布劳威尔 Brouwer, Henk

伊万诺维奇·贝尔格曼·马丁

Мартин, Иванович Бергман

曼德尔 Mander

米诺斯 МИНОС

菲利浦先生 Mr. Philipp

菲利浦 Philipp

孙铎 Sentot(为《向导》周报撰稿用的笔名)

西蒙斯 СИМОНС

鸣 ▼ 谢

本书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曾经得到国内外许多科研单位、档案部门和专家学者的帮助。

感谢荷兰皇家科学院向笔者提供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本项目的研究,并提供了本所收藏的档案以及该所从俄罗斯现代史料保管与研究中心(现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РГАСПИ)得到的共产国际档案中最近解密的有关荷兰共产党的档案。

感谢安东尼·塞奇教授(DR. Prof. Tony Saich)1987—1988年间在笔者为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而翻译其《The Origin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档案文献集)一书时向笔者提供的帮助。

感谢荷兰皇家科学院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著名的斯内夫利特(马林)研究专家狄克曼博士(DR. Fritjof Tichelman)为本书撰写了斯内夫利特年表并提供了有关斯内夫利特的档案文献。

感谢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馆长基里尔·安德森博士(DR. Kiril Anderson)向笔者无偿提供了在本书发表许多件斯内夫利特档案中译文的权利并为笔者查阅共产国际档案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马林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素描是由 K.V.舍维廖夫(石克强)教授提供的。

感谢本书主人公斯内夫利特的女儿西玛·斯内夫利特 Sima Sneevliet 提供的关于父亲生平重要资料的译文和录音带。

感谢斯内夫利特的侄孙亨克·史密茨 Henk Smeets 提供的珍贵史料。

感谢斯内夫利特战友的后代狄克·德文特尔(Dick de Winter)先生帮助阅读和翻译荷兰文、法文与德文档案资料。狄克·德文特尔先生介绍的极其生动有趣的背景知识丰富了本书的内容。

感谢萨尔·桑顿(Sal Santen)先生生前向笔者赠送的珍贵资料(书刊、照片、文物)和口述的有关其岳父斯内夫利特生平的大量史实。笔者永远怀念这位善良的终生为理想奋斗的战士。

感谢斯内夫利特纪念委员会的组织者玛丽娅 Marie 女士,是她向笔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参加 1992 年斯内夫利特及其战友殉难 50 周年的大型扫墓活动,笔者得以认识斯内夫利特的战友——年迈的蒂尼·德文特尔(Tenus de Winter)先生和他的家族,以及与斯内夫利特同时被害的所有烈士的后代。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系主任的罗梅君(DR. Prof. M. Leutner)教授和费路教授(R. Felber)向笔者提供了斯内夫利特一度为之奔走的中德俄联盟的档案。德国埃儿福特大学东亚史研究室主任墨轲博士(DR. Peter Merker)以纯熟的中文为笔者翻译了德文档案。日本神户大学文学部石川禎浩教授帮助核查有关的日本史料。在此一并深致谢忱。

西玛·斯内夫利特为本书写的前言

我非常高兴李玉贞教授写这样一本书。我知道荷兰有多种我父亲的传记,他的战友贝尔迪斯 M. Perthus 用荷兰文出版的《活跃于欧亚的革命社会主义者亨克·斯内夫利特传略》,狄克曼博士用法文和荷兰文出版的《斯内夫利特政治传记》和丰富的史料等等。我也看到了荷兰皇家科学院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收藏的那部分独一无二的关于我父亲生平事业的档案。但是只有这个中国人写的中文版的传记使我倍感兴趣。我想,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她一定是力求公平和接近历史。

关于父亲,我能记得的是他的敏捷思维,积极进取和很强的活动能力。至于他在国际舞台上是一个什么形象,我并没有什么记忆,因为我跟随母亲西玛·札尔科夫斯卡娅离开他从荷兰回到苏联的时候是1934年,我只有10多岁。从母亲口中听到,在我孩提时代的记忆中仅存的是,1923年夏天我在她腹中到过中国,当时她随父亲在广州短暂停留时,寓所里有很大的蜘蛛。

我是在经历了大半生的坎坷后才“找到”父亲。中国读者大概会慷慨地拿出一段时间读一读我不同寻常的经历。也许人们会从中悟出些什么。



我不敢相信,在阔别荷兰 53 年后我又回到了这片土地,能够“看望”我的父亲,不过是在他的墓地。我更没曾想像,在阔别这片土地后的半个多世纪后我又来这里生活。1934 年后我没有见过父亲。更有甚者,我几乎一生都被迫不能说起我的父亲,因为他是……?我不知道个中的奥妙。我只知道他是外国人,他反斯大林,他被扣上“托洛茨基分子”的帽子。“托洛茨基分子”一词在苏联甚至据我所知在其他某些国家都是反革命分子的同义词,是革命的叛徒,有一副凶神恶煞的面孔,是永世当此诅咒的犹太。由于种种宣传,这个词使人不寒而栗。在苏联,我的母亲西玛·扎尔科夫斯卡娅 Сима Жалковская——一个 1914 年加入俄共(布)的老党员——从来没有向我谈过我的父亲。母亲忍受着,到 1977 年去世,终生保护我们,不想让我们因为父亲而受连累,她希望即使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最多是“不知者不为过”而免于受追究。

我在塔斯社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别连斯基写的《印度尼西亚的觉醒》一书。从这本书的注释里见到关于父亲生平的极其简要的几行文字。我知道他早已不在人世了。可惜那时母亲已经辞世。这本书提供的线索没能帮我从母亲那里“掏出”任何故事。我不知道父亲“在哪里”,我默默地寻找着关于父亲的任何踪迹,特别是他的下落。很长的时间里我丝毫没有收获,我更没有想过我能去“看望”父亲。

直到 1985 年戈尔巴乔夫实行改革和公开性的政策后,我才认真考虑,我可以打听父亲的下落了。这中间有说不尽的甜酸苦辣。起初在 1986 年,我遇到的是各级有关部门从苏联时期沿袭下来的在处理这类事情中的谎言。我找到了苏联红十字会。得到的回答是:“对,你可以出国去给父亲扫墓。但是你要提供他墓地的确切地址,而且要证明墓地保存完好。”天哪!这是晴天霹雳,我哪里能够知道他的“确切地址”!我只能通过苏联红十字会去打听,其他



的途径在那个年份对于普通的苏联人是不通的。

我只好照章办事,领表,填表,然后是无限期的等待。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我几乎绝望了。过了5个月,终于有了回答:苏联红十字会告诉我,荷兰红十字会不掌握关于我父亲的任何线索。这显然是在说谎,连孩子都骗不了。可是我又有办法?我绞尽脑汁,忽然间峰回路转。我在慕尼黑有个亲戚,请他帮忙吧。果然,我从“资本主义”的德国得到了父亲墓地的确切所在。天助我也!

到了苏联红十字会,我向他们展示了那本书的注释和我得知的情况。那位女工作人员开始有些尴尬。说是让我等一等,她要去问领导。过了不长时间就回来了,并且带来一封打印好了的公函,上面第一句话就是:“经过我们的查找,现已知道你父亲葬在维斯特菲尔德墓地。”

“你们撒谎!不是你们‘查找’的!”话到了嘴边,我不敢说出。我算什么“人”?毕竟是他们“找”到了,还给我开了信。对于一个平民百姓这已经足矣。第一关总算通过了。办好了出境手续我已经精疲力竭,好像脱了一层皮。我在塔斯社工作的时候有个朋友,他奉派驻海牙,我和女儿到了荷兰就是他前来接迎和陪伴的。

那是1987年4月初,乍暖还寒。我和女儿到了维斯特菲尔德墓地。春雨绵绵。首先映入眼帘的不是通常墓地上的萧煞凄凉,而是郁郁葱葱的大树和墓碑前的鲜花。那正是郁金香怒放的时节。这是安慰也令人伤心。我的父亲就在这里。可是哪一个碑是他的?父亲,你在哪里?我流泪了。女儿流泪了。我们按照预先得知的号码一个个地查找。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雨停了。偌大的一片墓地……

微弱的阳光洒在湿漉漉的草地上。我们决定回到住所,过几天就是4月12日,说不定会有什么人在那一天前来凭吊。突然女

儿娜塔莎叫我：“妈妈，在这儿！”我看到了一个用砖砌成的两边成扇形伸展着的矮墙，约一米五高，五米宽，上面是拱形，纪念碑上刻着几个人的名字，八个是与我的父亲一起被杀害的，其余两人是在另外的地方同一天遭杀害的。我们母女献上一束郁金香，细小晶莹的水珠和着我们的眼泪滴落在花朵上，我们伫立良久……

我们还是决定再停留几天。离4月12日只有三天了。4月12日，又是一个荷兰常见的阴雨天气，我和女儿早早地到了墓地，用我们带来的工具清扫纪念碑周围。忽然眼前一亮，太阳出来了。接着我们惊奇地发现，碑前摆放了许多鲜花，不知是谁也不知什么时候种的郁金香，像是忽然从地里冒了出来，姹紫嫣红，洁白的，金黄的，还有名贵的“蒙娜丽莎”，每一株都捧出一个深深的酒杯。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上一年11月父亲的难友家属和后代种下的，每年扫墓前夕，还会有人专程前来收拾。“父亲，你看见了吗？”我含着泪低语。

“妈妈，你听，好像有人来，我听见有人说话”，是女儿的声音。

是的，我向大路那边望去，一位老者被人搀扶着步履蹒跚地朝这个方向走来，后面似乎还有不少。我和女儿守在父亲的墓碑前。人越来越多。似乎会有一个什么仪式。人们停步于这同一个墓碑前。

一位老者十分友好地问我们的身份，我们说明来意。他大呼：“我亲爱的，原来你还在。你怎么找到这里的？”这是萨尔·桑顿（Sal Santen），我的姐夫。

我和女儿像是见了亲人，无论如何控制不住眼泪，特别是当一位老妇人走近我，叫我“西玛妹妹”的时候，我几乎在大声哭泣。她就是我从没有见过面的姐姐，是父亲最后一位夫人带来的女儿蓓蓓，旁边是她的丈夫——我的姐夫，还有陌生的亲人们……约有100多人。



按照他们的规矩,先是举行一个仪式,由斯内夫利特纪念委员会主任玛丽亚读献词或朗诵诗。然后大家一起去附近的咖啡馆。第二天《自由荷兰报》上出现了伊戈尔·科奈里森的长篇报道和几幅照片,其中有我在1933年迎接父亲出狱时的照片,以及50多年后此次我和姐姐在父亲墓地见面时的合影等。

以后的事似乎就没有什么可说了。我移居到荷兰,同父亲的战友结婚了。现在我住在荷兰西北的一个滨海城市桑德福尔特,安度着晚年。

最后,亲爱的中国读者,我想同你们分享我的快乐。那就是1993年4月我到了中国。事情的原委是,1988年我认识了当时正在编译我父亲档案的安东尼·塞奇 Tony Saich 教授(他当时在莱顿大学汉学院),他告诉我,中国有一个叫李玉贞的教授在同步翻译他的书并研究斯内夫利特和孙中山。我把我在莫斯科的地址告诉了塞奇教授,请他交给李玉贞。就这样我开始同李玉贞联系上了。1991年我邀请她到我荷兰的家中做客并且向她展示了父亲收藏的一面锦旗,那是父亲从参加太平洋运输工人代表大会(1927年5月)的红色工会国际代表罗易手中得到的。父亲一直珍藏着,使它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纳粹占领者的搜查,父亲被难后亲人们收拾遗物时从桌子的底面找到的。姐夫萨尔·桑顿一直收藏着,1987年给了我。这件珍贵的文物应当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和李玉贞教授一起给江泽民先生写了信,表示了愿意把它交给中国并且愿意看一看父亲在中国的行迹。

1993年我到了中国。那也是荷兰郁金香怒放的时候。在维斯特菲尔德墓地,我要到中国这个消息引起朋友们极大的兴趣。人们不约而同地说,对了,应该去,这是斯内夫利特建筑了中荷友好的桥梁。我在中国见到了父亲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重温了那段历史。亲爱的中国读者,这可是我“第二次”到中国了,1923年



我母亲西玛·扎尔科夫斯卡娅怀着我“到过”广州和哈尔滨，“坐过”中国火车。

短暂的中国之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已经找不到父亲笔下那个破败穷困的中国。华夏大地的蓬勃生机使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充满了希望和好感。

最后向你们说的是，每年在4月12日前后，荷兰的维斯特菲尔德墓地总有一些人前来凭吊斯内夫利特和他的战友们。1992年斯内夫利特被害45周年的纪念会上，李玉贞教授献上了一束火红的郁金香，那是父亲“收到”的第一束中国人献的花。1993年，中国驻荷兰大使馆的人员也来参加纪念会。我想，人们纪念他，是因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他英勇地为真理、为正义事业进行斗争，他作为一个英雄死去。历史是公正的。

序

(一)

斯内夫利特 Henk Sneevliet(在中国人们习惯叫他“马林”)是荷兰人,1883年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卑下的社会地位使他过早地体味到世态炎凉,同时也造就了他向不公正的社会现象抗争的逆反心理。他来到人世的时候,北海之滨的荷兰还经历着繁荣时期,但是随着其社会经济发展而衍生的社会矛盾也已经十分突出,有志之士一直在寻求社会公平,西欧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相当发达。他以17岁的年纪投入了社会主义运动。他的情况很像俄国的“平民知识分子”。这个来自民间的人和他同时代的革命者一样怀有强烈的改变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愿望。欧文、傅立叶为人们描述过并短时间地创建过理想王国。社会条件的不成熟,使他们成为“空想社会主义者”。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号召人们用武力推翻旧世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世界。巴黎公社的勇士们做过尝试,但失败了。过了半个多世纪,在广袤的俄罗斯大地上,俄国布尔什维克经过多年的艰苦工作,在1917年遵循列宁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的路线,按照《共产党宣言》设计的道路,用武装斗争扫荡了俄国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如列宁所说在“一夜之间”建立了一个令世界瞩目的新型苏维

埃政权。其领导者认为这是一个不同于任何旧式政权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国家。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称这种道路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季诺维也夫等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世界形势做出了过于乐观的估计,认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已经在“扑打翅膀”。只需要“半年一年的时间,红旗将插遍全世界”。然而国际上也有一些社会主义者认为那不是什么意义深远的革命,而是社会爆发的动荡局势。说列宁等人表现了革命急躁性。这是一些被称为苏维埃敌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是“反革命派”。

但不管如何,革命的狂飙确实在彼得格勒那个寒冷的冬夜里摧毁了私有制。“和平法令”、“土地法令”表达了世代在有产阶级重轭下生活的人民大众的愿望,于是“黑手高悬霸主鞭”,他们成了国家的主人。农民有了土地,工人拥有了工厂。昔日的当权者统统沦为阶下囚,昔日的有产者要么被驱逐出境,要么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远看过去,那里似乎出现了一道耀眼的彩虹,那里似乎出现了人间乐园。

列宁——这个名字成了一个时代的象征。他以自己的功业同昔日俄国的和第二国际的“右派”、“中派”战友们划清了界限。他认为俄罗斯大地“风景这边独好”。于是世界上持不同政见的人们带着迷惑、不解、向往、羡慕、仇恨等极其复杂的心情关注着俄国事态,于是赞颂与诅咒共生,规劝与抵制并存。对于俄国革命,世界上有视为洪水猛兽者,于是严厉防范;有欢欣鼓舞者,于是起而仿效,这就是常说的十月革命的影响。

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本是社会主义运动中各派共同的目标,但是激进派把缓进派冠以“反革命”或“修正主义”的头衔。这个做法由来已久,俄国十月革命后两派的斗争更加激烈。本书主人公斯内夫利特属于前者。由于同本国社会主义者政见的分歧,他到了荷兰殖民地印度尼西亚,亲眼见到那里人民的悲惨生活状

况。在他还没有见到列宁之前很久,他就是列宁的知音,他自觉地宣传过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主张。俄国1917年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都焕发起他的政治热情。他成了一个志愿宣传者。为此他被捕,受到审判,最后被驱逐出印度尼西亚。是的,他为正义奋斗,他在法庭上做过大义凛然的辩护,为被压迫者呐喊。他没有当弱者。这是可敬的。

回到荷兰后,他在许多问题上同荷兰共产党和其他派别的人关系紧张,乃至组织上分裂,他几次另立门户。他同荷兰共产党的斗争,对苏共党内斯大林派同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所持的态度,他的一切都在共产国际的注意之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甚至从莫斯科摇控,下达指示以削弱他的势力。足见其处境的险恶。

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左翼托洛茨基主义形成的时候,斯内夫利特将其认作知音。由于许多观点上的共鸣,当托洛茨基本人被驱逐出苏联在国外开展其规模有限的运动时,当托洛茨基处境艰难时,他总是设法给予帮助,他谋求过同托洛茨基第四国际的联合。但是毕竟各自生活的国家不同,政治环境不同,托洛茨基认为斯氏平时具有“妥协”的倾向,而不同意接纳他为第四国际的成员。斯大林派遣的格伯乌在他们之间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使斯内夫利特至死都蒙受着冤屈。

多年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云激荡的时候,他的面目一直不清。由于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的斗争,不仅在苏联,就是在其他各共产党内也存在过相当严重的“谈‘托’色变”的气氛。斯内夫利特的面目也因此一直在雾霭中。他离异的妻子以特殊的方式呵护女儿,出于舐犊之情,不愿意她受到政治斗争的牵连,直到1977年去世也没有把斯内夫利特的情况告诉她,致使女儿从1934年离开父亲从荷兰回到苏联后,竟然在长达54年的时间里不知道父亲的下落。得知父亲情况后她自己不无感慨地对笔者说,我不知道为什

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批评我的父亲”。

然而我们不能不说他过分执著,不是吗,甚至在法西斯势力猖獗,荷兰已经被占领的形势下,他还主张按照列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方针,在反法西斯斗争的同时,建立荷兰的苏维埃;直到晚年,他坚持的都是反对斯大林主义但拥护苏联的立场。他不能分辨斯大林主义如何控制苏联,他心目中的苏联是一个真正的理想王国,事实上人们不得不承认,他对苏俄那里的社会制度并没有深刻的理解。

在后来的年代里,甚至终其一生,斯内夫利特一直执著地追求理想,他热情支持一切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和反法西斯斗争。他在西班牙内战的烽火中亲临战场,号召人们为正义而战。在纳粹疯狂屠杀犹太人的时候,他勇敢地组织人们进行斗争。最后为正义而献身。

也许他正是凭这一点赢得了人们的同情,每年深秋必有一些人来到维斯特菲尔德墓地,种下郁金香的球根,让它们伴着烈士度过漫长的冬天。而来年的4月1日前后,斯内夫利特的战友和他们的亲友都会前来祭扫陵墓,并举行简短的仪式。阿姆斯特丹有不少街道用他的名字命名。1992年笔者曾经问及荷兰皇家科学院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的狄克曼博士和斯内夫利特的女儿西玛,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的答案是一样的,“因为他是英勇的反法西斯战士”。这说明了历史的公正。

(二)

在斯内夫利特的祖国,学者们对他的研究相当深入、全面。单是1994年出版的书目就达246页之多,收入论著多达上千种。皇家科学院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拥有第二、第三两个国际的部分极

其珍贵的档案。斯内夫利特的女婿萨尔·桑顿(Sal Santen)向荷兰皇家科学院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捐赠了存藏多年的斯内夫利特的私人档案。该研究所同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有密切联系与合作。这一切使荷兰学者们得天独厚。斯内夫利特的战友贝尔迪斯写的《活跃于欧亚的革命社会主义者亨克·斯内夫利特传略》，狄克曼博士的荷兰文与法文版《斯内夫利特政治传略》，他编的《斯内夫利特与罗兰-霍尔斯特通信集》，他和史维德合编的关于斯内夫利特1918年在印度尼西亚受到的《审讯》(档案史料)，安东尼·塞奇博士的《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的起源》(档案史料)则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基础。

我国80年代曾经由人民出版社出了《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初版和再版。1989年安东尼·塞奇博士书中档案部分的中文译本《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出版，为学术界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1990年存藏于俄国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共产国际档案解密，德国和俄罗斯学者联合编辑了大型档案文献资料《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目前已经出版3卷)，挖掘出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鉴于篇幅，他们没有选取斯内夫利特的信件。承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主任基·安德森博士的厚爱，本书作者在1994—1995、1999、2000年访问俄罗斯期间得到了这许多珍贵文件，并获准在本书发表译文。1998年3月蒙荷兰皇家科学院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所长克劳斯特曼博士(J. Klosterman)准许在该所阅读和复制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得到的关于荷兰共产党的档案。我国上海市档案局存藏的少量档案也有助于本书写作。

另外，笔者曾经同丈夫王先生一起于1994年应斯内夫利特的女婿萨尔·桑顿之邀在他的家中居住一个月。那30天里，萨尔·桑顿先生把每天晚上定为“口授历史”时间。笔者不仅得知了许多关